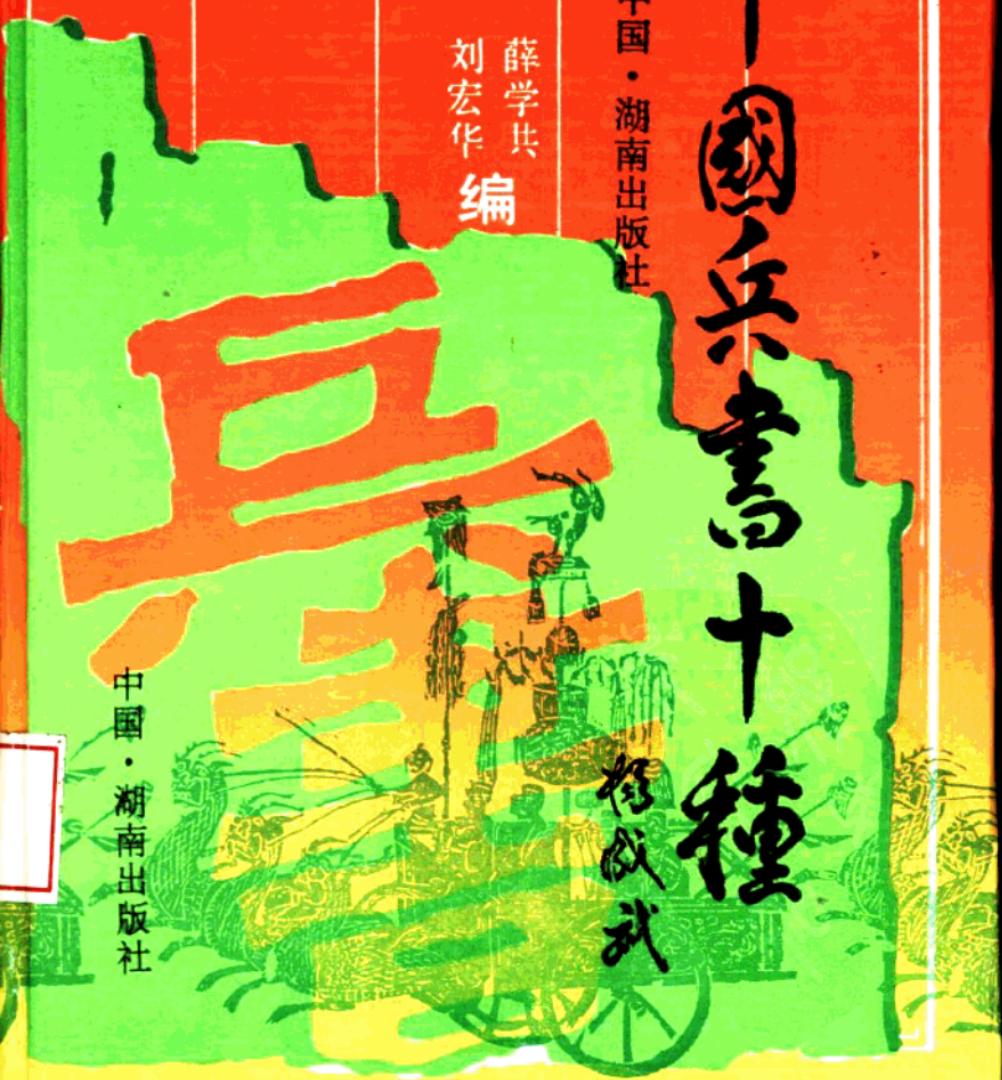


中國兵書六十種

中国·湖南出版社

徐子宏
薛學共
羅德俊
劉宏華
編

卷之三



中国·湖南出版社

序

中国历代兵书素以其博大精深的内容著称于世，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据陆达节《中国兵书现存书目》所计，当在二千种以上，至今尚存者，亦有四百种之多。面对这卷帙浩大、内容繁富的理论武库，不仅整理出版困难很大，即使有心涉阅也有无从下手之感。湖南出版社此次编纂《中国兵书十种》，意在化繁难为简易，提纲挈领地反映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理论的主要内容。这一作法值得赞赏。

徐子宏、薛学共、罗德俊等同志披览群书，沥沙淘金，自春秋至清季的兵书中遴选了其中影响较大的著作十种编纂成书，细绎其目，颇具眼光。作者并撰兵书题解十篇置于其首，其文事有佐证，言有考订，分析中肯，评介得当，为读者阅读此书作了铺路的工作。

古代军事理论遗产的整理研究于弘扬民族文化意义重大，又是我们国防教育及军队建设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故我乐为之序。

《孙子》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军事名著，为春秋末期齐人孙武所著。此书总结了春秋末期及以前的战争经验，问世以来就被尊为“兵学圣典”。它的影响极为深远，现在，许多国家的军事界、学术界、乃至企业界、体育界都甚为重视此书，一个国际性的《孙子》研究热正在兴起。

《吴子》是继《孙子》之后，我国军事史上又一兵学名著。相传为战国初期吴起所著，问世之初即与《孙子》齐名，人称“孙吴兵法”。

《司马法》即《司马穰苴兵法》，据说是战国中后期齐人司马穰苴追述古司马兵法而著。其内容闳廓深远，多有精辟见解，在中国军事理论上有很高的地位。

《尉缭子》的作者及成书年代争论颇多，尚有待研究考订。现在一般都认为是战国梁惠王时的隐士尉缭所著。此书在诸多兵法中也具有较重要的影响和地位。

《六韬》在《隋书·经籍志》中记载是“周文王师姜望撰”，但实际上则可能是战国时期人们伪托姜望（即姜子牙）之名所作。此书通过周文王、武王与姜望的对话形式，阐述治国治军理论，曾受到历代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重视，可见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兵学著作。

《唐李问对》是唐太宗李世民与卫国公李靖多次谈兵的言论辑录，论题十分广泛，内容非常丰富，尤对“奇正”关系的阐述更为突出。此书对自春秋战国以来古兵法有重要发展，也是唐代兵学的代表作。

前述的六部兵书在宋代和《黄石公三略》一起被定为《武经七书》。《武经七书》是宋神宗年间颁行的武学必读教材。南宋时，又指定为考核将领的主要内容。《中国兵书十种》的编纂者将《武经七书》中的《黄石公三略》删去，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此书大量征引古代兵书《军诫》、《军势》之语，本身欠有特色，另外书中的预卜吉凶等用语迷信色彩较重，选录意义不大，故略去是有见地的。

《孙膑兵法》又称《齐孙子》，在我国历史上曾闻名一时，是战国中后期齐人孙膑所著。据《史记》所载，孙膑为孙武的后世子孙。此书约于东汉末年失传，直到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

墓出土的竹简中，才被发现。整理出来的《孙膑兵法》，尽管断章残篇较多，但仍可披见其主要精神。

《百战奇略》原书托署为明人刘基（伯温）所撰。此书的作者经精心选择大量的战例，按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分为百题，分篇立论，对比分析，较好地论述了用兵之道与作战方法。这不仅在当时影响较大，对现今也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戚继光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民族英雄和军事家，他有《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这两部重要兵书留世。二书的特点是学习古人而又不因循守旧，着眼于变化了的战争条件，提出了许多超迈古人的见解。可以说，戚氏的兵学代表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军事学术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次选录的《练兵实纪》，是作者在撰写《纪效新书》的基础上，根据华北、蓟北长城一带的敌情、我情撰写的；其中保留了前书中练兵经验的精华部分，又根据大规模练兵御敌的需要，突出了练将的内容，这也是戚继光兵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曾胡治兵语录》是一部语录体的兵书，原为中国近代军事家蔡锷编撰，选辑清代咸丰、同治年间的曾国藩、胡林翼二人的治兵语录，并加自己的按语而成此书。1924年，此书作为黄埔军校教材，并增辑了《治心》一章和左宗棠的若干语录，以《增补曾胡治兵语录》为名出版。此书在治军、作战方面的论述有较多精辟的见解，有一定的军事学术价值。

《中国兵书十种》的编纂和出版，对于我国军事学术科学的普及和繁荣无疑有很重要的意义。但值得指出的是，这十部兵书都产生于封建时代，是漫长的封建时代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的总结，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读者应本着批判的态度去阅读理解。尤其是曾、左、胡等人的军事思想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中产生形成的，更应该对其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予以批

判。这些问题，读者当自能鉴别，这里就不多说了。
是为序。

方等

九九年夏北京

武庫精華

歐陽穀
著

挖掘古代兵書精華
為我國防建設服務

齊光義

古為今用
張平化題

兵家致勝之道

何正文

总 目

孙子	(1)
司马法	(23)
尉缭子	(41)
吴 子	(71)
孙膑兵法	(89)
六韬	(123)
唐李问对	(173)
百战奇略	(199)
练兵实纪	(257)
附练兵实纪杂集	(371)
增补曾胡治兵语录	(437)

孙 子

题解	(3)
卷上	(8)
始计第一	(8)
作战第二	(9)
谋攻第三	(9)
军形第四	(10)
兵势第五	(11)
卷中	(12)
虚实第六	(12)
军争第七	(13)
九变第八	(14)
行军第九	(15)
卷下	(17)
地形第十	(17)
九地第十一	(18)
火攻第十二	(20)
用间第十三	(20)

题解

《孙子》，亦称《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军事著作之一，在世界军事学术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被人们誉之为“兵学圣典”。它不仅在军事理论建设上具有极高的借鉴意义，同时，它的思想方法和策略原则在诸如商业竞争、体育竞技等社会生活领域中也得到广泛的运用。

《孙子》的作者及成书年代，自春秋至隋唐，似乎都没有出现过争议。《史记·孙子吴起传》说：“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尽观孙子十三篇兵法，大为称许。《韩非子·五蠹》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隋书·经籍志》确称《孙子》为“吴将孙武撰”。

自宋以来却有人对此质疑。欧阳修说孙武之书是“战国相倾之说”（《居士集·孙子后序》）。叶适说，《左传》未对孙武作任何记载，可见孙武只是“辩士妄相称指，非事实”（《习学记言》）。全祖望说：“其书其事皆纵横家之所伪为者。”（《鲒埼亭集》）钱穆说：“其人与书，皆出后人伪托。则《孙子十三篇》洵非春秋时书，其人则自齐之孙膑。”（《先秦诸子系年考辨》）自宋人对孙武其人其书提出质疑，此案就一直悬而难决。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了《孙子》和《孙膑兵法》两种竹简，竹简明确写有“吴王问孙子曰”，“齐威王问用兵孙子曰”。此与《史记》所载基本相符。可以确证吴王时孙子，即孙武，齐威王时孙子，即孙膑，各有兵书传世。千年聚讼，一朝

得释。

孙武，春秋末吴国将领，字长卿，齐国乐安人（今山东博兴北）。当时齐国内乱，孙武出奔吴国，羁旅于姑苏附近，潜心研究兵法。公元前512年，吴王阖庐准备大举伐楚，闻孙武能用兵，即召见。孙武献上兵法十三篇，又以宫女试阵，深得吴王赏识，被任命为将军。其后孙武统率吴兵，“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

《孙子》全书共十三篇，论述了“计”、“作战”、“谋攻”、“军形”、“兵势”、“虚实”、“军争”、“行军”、“地形”、“火攻”、“用间”等问题，对于当时的战争经验作了充分的总结，提出了一些著名的军事命题，揭示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战争规律。

《孙子》首次对战争的致胜条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战争的致胜因素是多方面的，在宏观战争的诸因素中，孙武认为，战争致胜因素有五：“道、天、地、将、法”。“道”指的是政治策略，“天”指的是气象条件，“地”指的是地形环境，“将”指的是将帅才具，“法”指的是军纪军制。在这五个因素中孙武特别强调“道”的作用，他觉得恩信使民比上顺天时、下顺地利、委任贤能和节制严明都更重要，“令民与上同意”是战争致胜之本。山东出土的汉简《吴问》，也记叙了孙武与吴王问对时所谈的爱民主张。《吴问》中论及晋国六将军“孰先亡”、“孰固成”，孙武认为这决定于施行田亩制的大小和赋税的轻重。亩大税轻“厚爱其民”者可以“固成”，反之则将“先亡”。这与《孙子》中的“五事”之说是互相联系的。表明了他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具有朴素的民本思想。

孙武认为衡量战争的胜负条件还要校之以七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七计大略概括了决定战争胜负的几个基本因素。

《孙子》不仅对当时战争条件下出现的各种复杂形式作了具

体的探讨，更可贵的是提出了许多哲理化的军事命题。“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名言就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孙武在书中把“知”与“战”的关系作了详细的阐述，认为只有“胜可知”才能“胜可为”，做到“先胜而后求战”。毛泽东对这一思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指出：“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确实，孙子这一思想对于指导战争具有普遍意义，是对我国军事思想的一大贡献。

所谓“知彼知己”，孙子作了专门论述。“知彼”就是要“察敌之情，审敌之势。”包括“知诸侯之谋”、“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知战之地、知战之日”；“知己”就是要“知吾卒之可以击与不可以击”，“知可以与战不可以与战”。他总结说，知己知彼缺一不可，“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孙子》不仅探讨了战争致胜的军事条件和战术手段，同时还提出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战略思想，把政治斗争、外交斗争和军事斗争作整体考虑，“必于全争于天下”，体现了战略家的卓见远识。

在战术思想上，孙武在书中提出的“速胜”原则、“出奇制胜”原则、“致人而不致于人”的原则、“避实而击虚”的原则，都是经过长期战争实践锻炼的经验总结。孙武还特别强调战略战术的灵活性，提出了“因敌而制胜”的思想，他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他要求军事指挥员须懂得“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可与不可之间，独断于心。战争形势瞬息万变，移步换形，“因敌变化”精辟地表现了战场机变艺术的灵魂。

《孙子》对我国军事学术思想的发展贡献是巨大的，其理论总结的开创之功尤不可没。但是我们也须注意到《孙子》的时代特征和某些缺陷。《孙子》于春秋末期问世，当时尊王攘夷的历史主题逐步趋于淡化，继之而起的是以强并弱，列国争雄的潮流。这一社会变局，给《孙子》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它一扫往日中原诸侯所尊尚的揖让之礼、整暇之节，以大邱小的恭谦风度以及兄弟甥舅之间的虚假礼饰，明确提出“兵者，诡道”的作战原则，通篇表现了旨在破国覆军，攻城掠地的功利思想和深入冒险的好战尚武精神。

《孙子》的战略战术设计，主要是从吴楚两个大国争霸的形势出发，以吴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并占据主动进攻的战略地位作为依据的。从它的“以全争于天下”的宏观战略到分数、刑名、奇正、虚实等战术规定，其理论的各个层次，主动进攻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套军事理论就其整体应用性而言，实际上是以强对强、以强凌弱的霸王之兵道。

《孙子》的大部分章节可以说是最详尽的作战手册，其基本精神带有浓厚的战场处断色彩，其精华亦在于精辟地分析了两军对垒和单国决战的战争形势和战术问题。而对于春秋末期在政治军事舞台上已经出现的长期战略问题，如楚国叛臣巫臣提出的两线作战疲劳楚军的思想、晋国智莹“三分四军”、“三驾败楚”的典型战例，吴国伍子胥“三师以肆，多方以误之”，最后“五战八郢”的精采战史，均未予以充分注意，反而强调“兵闻拙，未闻巧之久也”，这就有失偏颇。

此外，春秋末期已经出现了交织着政治斗争、外交争夺的统一战线的整体性战略思想，至于晋文争霸、晋悼复霸所采取的一系列策略，都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孙武对之也没有予以充分重视。甚至排斥这种考虑，他说：“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

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这种大国实力思想，势必产生军事上的短期行为。孙武虽然指导吴国在军事上取得一系列胜利，但也引导着吴国踏着胜利的鼓点步入绝境而不自觉。新败之越国正是利用吴国的大国实力思想在胜利面前恶性膨胀的时机，诱其结怨楚越、交仇齐晋，处于四面敌国之中。就在孙武断言“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之后仅仅 14 年光景，越国反倒把吴国灭亡了。这一历史悲剧的意义是十分丰富的。

今天我们研读《孙子兵法》既要看到它的闪光的名言，也要看到它的基本精神和某些不足之处。但白璧微瑕，断不伤其全体之伟大。

正文据中华学艺社影宋刻《武经七书》本，又参照他本，略有校改。